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丛
CHINESE ECONOMIST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马洪改革论集
A COLLECTION OF MA HONG'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丛
CHINESE ECONOMIST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马洪改革论集

A COLLECTION OF MA HONG'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洪改革论集/马洪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7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丛)

ISBN 978 - 7 - 80234 - 200 - 2

I. 马… II. 马… III. 经济改革—中国—文集
IV. F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9125 号

书 名: 马洪改革论集

著作责任者: 马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4 - 200 - 2/F · 737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咨询电话: (010) 68990692 6899062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fazhan@drc.gov.cn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马 洪

出版前言

Publication Foreword



这套丛书，是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继续推进这场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而编辑出版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的伟大事业。经济学家是非常活跃和有贡献的群体。这套丛书各卷的作者，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和直接参与者，是长期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的经济学家。他们之中有改革开放之初已年过古稀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最年轻的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有的主持或者参与过关于改革和发展重要课题的研究，有的参与过党和国家关于推进改革开放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

这套丛书各卷所选的文章，大多是过去30年间对中国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发生过直接影响的调研报告、政策建议、理论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各卷文章，都是由作者自己编定的；已经去世的薛暮桥和马洪，是由他们的后人编定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探索中前进的过程，读者从这套丛书

里，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对于改革开放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以及他们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见解和思想历程。

这套丛书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倡议的，得到各位经济学家的积极响应，得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年5月

作者简介

Author's Introduction



马 洪，1920年5月18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待阳村。原名牛仁权，1938年春在延安时改名马洪。曾用名牛黄、牛中黄。2007年10月28日逝世。

马洪出身贫寒，13岁时被当地小学聘为教员，开始自食其力。他自学中学课程，并协助当地著名爱国人士、族人牛诚修先生修订《定襄县志》。从那时起，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参加了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和集会，爱国思想日益浓厚。1936年初，经人介绍马洪到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局）工作，先当录事（即文书），后考入同蒲铁路车务人员训练班（半工半读）。在此期间，他当过售票员、行李员、运转员等。他努力自修学业，阅读进步书刊，不断开阔眼界。

1936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积极参与了同蒲铁路总工会筹备工作，是总工会负责人之一。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著作。1940年冬调到《共产党人》

杂志任编辑，1941年秋任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学术秘书。1942年随张闻天赴陕甘宁边区神府地区和米脂县杨家沟以及晋西北村镇进行一年半的调查，逐步养成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事实说话的治学风格。1946年1月被派到热河省平泉县任县长，1947年秋任宁城县委书记、土改工作团团长，1948年6月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马洪先后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1952年11月调到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参与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体设计。1954年10月起先后担任北京第三、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副经理。1956年6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研究室负责人，参加和主持了对20多个城市厂矿企业的调查。1961年带领调查组到北京第一机床厂进行调查，参与起草了《国民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70条），为主要执笔人之一。1965年8月任化工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1970年7月任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设计院副院长，1972年任总厂30万吨乙烯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1977年7月任国家计委组织的大庆经验编写组组长，到大庆深入考察，虚心向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请教，了解计划、科技、劳动、物资管理情况。

1978年5月，马洪受命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党委书记。1979年4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党委书记。1982年6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第二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

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工作期间，马洪强调“社会科学院要做党和政府的助手”。他多次指出，搞科研最重要的是选好课题，应当注意充分发挥每个科研工作者的专长和积极性、创造

性，既要加强应用研究，也要重视基础研究。同时阐述了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方法包括研究对象的正确选择，科研工作的合理组织，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新的科研工具的应用等理论。马洪在经济管理、经济改革、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等学科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开拓性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1年，他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问题以及如何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建议，具有很高的理论深度和现实指导意义，是当时国内外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很有影响的一本书，曾分别在原苏联和美国用俄文和英文出版。1983年，他主编了《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就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独立核算的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经济单位，而“实行独立核算的这个构成企业的标志实际上包含了获得利润和建立独立会计的双重含义”；阐述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本质问题。

1981年马洪主持成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由两国政界经济界著名人士组成，讨论世界经济和两国经济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及如何改进双方的关系，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91年主持成立了中韩经济知识交流会，积极推动了中韩两国建交和两国经贸往来。并积极推动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福特基金会的合作研究，对我国长期发展和地区发展规划以及产业的合理布局起了积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洪受命负责组建国务院直属的政策咨询研究机构。1981年5月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会总干事，1985年10月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1990年12月兼中心党组书记。1993年4月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马洪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研究国民经济、技术、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把宏观与微观、长远与当前、战略与策略、发展与改革、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了解动态，分析矛盾，研究对策，预测前景，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直接为中央决策服务。1982年10月，他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组织“2000年的中国”研究，动员了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同志、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组成了多学科专家团队，对2000年的中国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进行了研究预测，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对“七五”计划的制定有重大影响，获国家科学进步软科学一等奖。1983年10月，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他领导开展了“新技术革命和我国的对策”问题研究，在分析了世界高新技术革命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及重点产业发展的方向，该项成果获得了国家奖。这项研究对我国高技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86年，根据中央的安排，主持了“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研究。

马洪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也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1984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决议中。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编写一本宣传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的读物，马洪同志组织一些专家学者共

同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江泽民同志亲自主序。该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十余年来的改革作了系统的回顾、总结和升华，对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理念起了积极的作用。

马洪主张稳健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主张经济发展应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剖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弊端，建立合理经济结构的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技术革命与对策、经济发展战略、企业管理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期间，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发展特区经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江经济带开发、发展区域经济、沿边境地区开放、制订品牌发展战略、欧亚大陆桥等。他在理论研究中强调事实和数据的运用，是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积极倡导者。2005 年 3 月，马洪同志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他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马洪是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是新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开创者、带头人、领导者之一，是享誉中外的经济学大师。长期从事经济管理、政策研究、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际情况，深入调查，考察国情民情，注意从国外汲取营养，不懈地追求新鲜事物，始终站在理论的前沿，面对我国现实的重大经济问题和发展战略，保持着在学术上的青春和活力。

马洪曾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客

座教授，为改革开放事业培养了许多高级专业技术骨干，有的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有的已走上部门领导岗位。马洪思维敏捷，善于发现抓住新生事物，凭着勤奋、严谨、执着、求实的精神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尊重。

目 录

Contents



- ▶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 1
(1979 年 8 月, 1980 年)
- ▶ 关于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若干问题 46
(1980 年 3 月 14 日)
- ▶ 满足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使命 51
(1981 年)
- ▶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67
(1981 年)
- ▶ 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 ... 89
(1982 年)
- ▶ 特区建设和沿海城市开放的几个问题 103
(1984 年)
- ▶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 117
(1984 年 11 月)
- ▶ 研究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150
(1985 年)

- ▶ 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 160
(1985 年)
- ▶ 略论中心城市的重要地位和功能 172
(1986 年)
- ▶ 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大变革 191
(1987 年)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与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

(1979年8月, 1980年)

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经济结构的调整

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年4月, 党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 决定从今年起, 用几年的时间, 对我国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接着, 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 会议的报告详细地阐述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调整时期的工作和新的“八字”方针, 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议, 在同年6月下旬, 召集国务院财经各部的负责同志和在京的搞经济理论工作的同志一起开会, 要求大家结合起来, 对当前我国经济情况和有关政策, 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并决定成立4个小组, 负责这一工作。这4个小组是: 经济管理体制组、经济结构组、引进技术和现有企业的现代化组、经济理论与方法组。

这4个组的任务, 就是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对如何更好地

^{*} 本文第一部分是作者1979年8月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 第二部分是作者1980年给国务院的建议。

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加快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议。

财政经济委员会要我做经济结构调查研究小组的召集人，所以就关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谈一些想法。

邓小平同志在 1979 年 3 月 31 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要降低现代化的标准，而是要实事求是，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搞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央的一位领导同志最近说：从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来说，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在 20 世纪末可能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目前我国已有 9 亿多人口，搞不好到 20 世纪末还会增加，这样多的人口，要达到当时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是不容易的，能达到他们现在的水平就很不错了。要把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分别开来。无疑地，我国人民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水平是会有很大的提高的，但要达到当时最发达的国家的水平，则是困难的。这一点，应当搞清楚。

总之，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就要看看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既不是国民党时代那样一个旧中国，也不是解放初期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国。解放以前，我们国家的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 10%，农业占 90%。这一点，毛泽东同志的很多文章，中央的很多文件里边都讲了。而现在呢？1978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里工业占 72.2%，农业占 27.8%。这种统计法，究竟是否符合实际，还可以研究。但是，我们国家的状况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则是肯定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解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解放以前，我们中国的产业职工只有 300 万人左右，而现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业职工有 4000 多万人，全部工薪劳动者约有 1 亿人。解放

以前，全国的大小工厂也不过十来万个，而现在我们有 35 万个企业，加上交通企业有 38 万个。其中，大中型企业就有 4000 多个。我们现在全国拥有的各种机床共 268 万台，比日本和联邦德国现在拥有的机床还要多，当然在质量方面比人家差得远。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现代化的工业。比如说，北京燕山石油化学工业公司、上海的石油化工总厂，还有近年来引进的 13 个年产 30 万吨合成氨的大型化肥厂，以及武汉引进的一米七轧机，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化的企业，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甚至后期的水平了。但是，这种工业企业我们还不太多，多数的企业还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此外，还有大量比较小的、比较土的企业，比如“五小工业”等等。应该看到，我们已经有了了一定的基础了，这个基础不仅解放以前没有，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基础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它比苏德战争以前苏联的基础要强得多。1941 年苏联只产 1800 万吨钢，而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3100 多万吨钢，比那时候的苏联强多了。但是，苏联以它那个基础就打败了希特勒，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所以，我们应当重视现在这个基础。这是我们前进的出发点、前进的基地。我们一定要从这样一个现实出发，来考虑我们的问题，离开这个基地，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前进。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国家人口是很多的，有将近 10 亿人口，其中 85% 还是农民。我们的人口占世界的 1/4，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在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我们还在 100 位之后，就是说还很落后。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搞现代化的。离开了我们现有的基础、我们的条件谈现代化，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也一定搞不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我们就要考虑怎样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克服自己不利的条件，即趋利避害。

我们的有利条件是：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又有这么多人口，人民又勤劳勇敢，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社会主义的制度，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 30 年来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另外还有